

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河洛文化与民族复兴研究丛书
《河洛文化的对外传播与交流》

丛书主编 李学勤 赵金昭 史善刚

薛瑞泽等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河洛文化的对外传播与交流



河洛文化的对外传播与交流

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河洛文化与民族复兴研究丛书
《河洛文化的对外传播与交流》

丛书主编 李学勤 赵金昭 史善刚
薛瑞泽 徐金星 许智银 著

河洛文化与民族复兴研究丛书编委会

总指导顾问:吉炳轩(黑龙江省委)

指 导 顾 问:连维良(洛阳市委) 张国祚(全国社科规划办)
陈义初(河南省政协) 杨 光(国家教育部)

学 术 顾 问:李学勤(清华大学) 汤一介(北京大学)
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 李 申(中国社科院)

顾 问:郭洪昌(洛阳市政府) 杨祥麟(豫运台古物监委)
周宗良(洛阳市政协)

总 主 编:李学勤 赵金昭 史善刚

编 委:(依姓氏笔画为序)

史善刚	安国楼	李晓敏	李焕有
杨祥麟	杨海中	杨晓塘	张得水
张留见	赵金昭	徐金星	梁锦瑞
黄黎星	扈耕田	程有为	温玉成
董延寿	鲁庆中	谢琳惠	薛瑞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洛文化的对外传播与交流/薛瑞泽等著.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215 - 07432 - 3

I. ①河… II. ①薛… III. ①文化交流—文化史—河
南省 IV. ①K296.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2313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88036)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永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22.25

字数 344 千字 印数 1 - 4000 册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丛书总序之一

这部《河洛文化与民族复兴研究丛书》共分六卷,共约 180 ~ 200 万言,撰写计划从 2006 年起实施,经过多位作者集体努力,现已如期成稿,即将付印问世,是一件非常值得纪念的事。丛书的创意设计,出自赵金昭、史善刚两位先生,他们也是全书的组织者。我由于长期与洛阳学术界有深厚因缘,厕名其间,实际没有什么贡献,这是必须在这里说明的。不过我一直认为“河洛文化与民族复兴”这个题目很是重要,于丛书出版时写几句话以为推荐介绍,是我应该做的,也正是我的荣幸。

近年我写过几篇小文,参与有关河洛文化的讨论,还有若干序跋,从不同角度谈及这方面的问题。回想起来,写这些文章的动因,都是鉴于国内区域文化研究的日见兴盛,觉得进一步推动河洛文化的探讨很有必要。如我几次谈过的,分区域地论说中国历史文化,固然是古已有之,然而区域文化研究的形成风气,却主要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学术界深入认识了中国传统文化是多源的、多线的,从而各种区域文化进入历史学、考古学等学者的视野,不少还成为学术研讨的热门。尤其是中原以外,曾经在传统上受到忽视的地区,更成为这种研究的用武之地。所谓“中原中心论”的偏向,于是得以纠正。

然而这里还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忽略了中原地区同样有其区域文化,而且是特别重要的区域文化。记得在 1981 年,我为《中原文物丛谈》作序,便谈过:“中原地区在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本为众所熟知,但中原和周围地区又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我国从来是一个疆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为国内各民族所共同创造。……关于中原以外地区文化的新认识,使我们不得不

考虑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究竟还能不能称为中国文明的摇篮?我觉得,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应该是肯定的。尽管我们对各地的文化发展有了新的估计,必须认识到,中原在我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仍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作用。这是由于当文明产生萌长的时期,中原地区是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中心枢纽。”河洛是中原之核心,所以此处说的中原文化即是河洛文化。

现在大家都熟悉洛阳一带古时被称为“天下之中”了。这个观念的起源真是古老,至少可以追溯到夏朝在当地建都。周武王克殷之后,在选定新邑(即后来的成周)地址时,就是这么说的。周朝宗周、成周两都大势的奠定,成为后世长安、洛阳都邑传统的张本,于历史上意义之大,怎样形容都不过分。到北宋,国都另已东移汴京,当时李格非(李清照的父亲)仍在《洛阳名园记》说:“洛阳之盛衰者,天下治乱之候也。”足见这一地区影响之长久深远。

中原地区与周围地区,中原文化(河洛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其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我认为必须作动态的考察。我们讲的动态考察,大概说有这样三个方面:

首先要注意文化的不平衡性。各个地区的文化,总的来看历史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有一个或一些地区,有发展上超前于其他区域。比如说上面提到的,在夏商周“三代”时期,中原地区有其特殊的优越之处。

其次是文化的变迁性。文化演进流动不居,各个历史时期在其性质、特征等方面均有不同,不能简单化、公式化。尤其是当历史发展的几个重要转折关口,变迁的迅速剧烈每每出人意外。

再有是文化影响的多向性。不同区域文化之间,不可避免有彼此影响,而影响一般说不会是单向的。即使在文化发展程度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后进的文化区域也会对先进的区域产生影响,况且文化差异常常很难说是“后进、先进”。

总之,我们观察和研究像河洛文化这样的重要的区域文化,一定要注意到其在历史上的动态的关系。

“河洛文化与民族复兴研究丛书”正是这样。读者很容易看到,丛书中第三卷《河洛文化与中国易学》、第四卷《河洛思想文化研究》和第六卷《河洛宗教文化与艺术》,对河洛文化的中心内涵进行综合的分析和探索;第一卷《河洛文化

与闽台文化》、第二卷《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还有第五卷《河洛文化的对外交往》，则对河洛文化的衍流与传播重点作出研究。几卷书虽出各家学者之手，却能互相配合呼应，相得益彰。

河洛文化在中国历史上起过如何的重要作用，又怎样演进传播，影响广及全国各地，同时与境内外种种文化融合交流，还有许多深层问题有待今后探讨。希望这部丛书的工作一定要继续下去，取得更多更新的成绩。

李学勤

丛书总序之二

“河洛文化与民族复兴研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所以说它重要，不仅仅因为河洛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一条根脉，而且因为它把河洛文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联系起来，并进而把河洛文化与闽台文化、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河洛文化与寻根文化等有机地联系起来、与台湾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联系起来。台湾问题事关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台湾与祖国大陆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热切期盼。因此，把河洛文化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联系起来、与民族精神联系起来、与民族和谐联系起来、与祖国统一联系起来进行深入研究，其意义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就这套研究丛书的基本内容，我想谈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河洛文化的传承问题

河洛文化的传承，既包括它在中原地区内的继承与发展，又包括它在中原地区以外的传播与演化。从历史上看，河洛文化对中原以外地区的传播，主要是通过移民来实现的。自秦汉以后，汉人逐渐南迁，南迁所到之处，比较集中的地方就是闽南和广东等地。由闽南渡海又来到了台湾。中原河洛移民从闽南到台湾，带着汉民族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先进的文化，开发和建设了闽南地区和台湾地区，并与当地的民族交往、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闽台地域特色的文化形态。但说到底，闽台文化与中原河洛文化是同根同源的。二者之间完全是一种血缘关系、宗亲关系和源流关系。

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又是一种什么关系的呢？同样是一种宗亲关系、血缘关系和源流关系。所谓“客家”是相对于“祖亲”而言的。“祖亲文化”意指土生

土长、世代因袭繁衍的文化;“客家文化”则指迁徙而来、客居他乡带来的文化。就地域来说,闽台文化主要是指与福建和台湾区域特色相结合的河洛文化,而以河洛文化为母文化的广义客家文化则传播到世界的许多地方。如今的客家人,已遍布于亚洲、美洲、澳洲,以及欧、非洲等五大洲之内。不仅在美国、日本、印度、英国等大国有客家人,而且中美洲的牙买加、千里达小島、印度洋的毛里求斯、太平洋的斐济和大溪地等也居住着客家人。据统计,客家人在海外的总人数可达上千万之多。正是这些客家人,带着中原的河洛文化,又吸纳并融合当地的文化,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外的客家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海外的客家文化是河洛文化的一种国际形态。

河洛文化与寻根文化的关系,也是本丛书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寻根文化是指移民们在寻找自己的血统根脉、姓氏起源、先人始祖、家乡故土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由于河洛文化是海外客家人的文化根脉,所以,海外客家人自然会通过学习和研究河洛文化作为寻根的重要途径,也就是说,河洛文化是海外客家人的寻根文化,也因此,让河洛文化走向海外、走向世界,就有了极大的空间,深化和拓展河洛文化的研究将有利于凝聚海外华人的祖国向心力,有利于推动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

第二,关于河洛文化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的历史地位问题

河洛文化在整个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又是居于什么地位的呢?对于此一问题,我们只有从历史上来作一深入考察才能给予回答。从近代的考古发现来看,从新石器时代中的裴李岗文化,到仰韶文化再到河南龙山文化,大多数都集中于中原河洛地带。而同这一历史时期相对应的就是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由此观之,河洛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率先进入到了文明时代。到了夏、商、周三代,而河洛文化又是处于什么地位的呢?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云:“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之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唐人指的是唐尧、虞舜,殷人和周人则指的是殷商王朝和西周王朝。这里所说的三河,就是指河洛地带。从近代考古发现来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确证了二里头文化乃河洛地带夏部族所创造的夏文化,是河洛物质文化遗存在夏代的集中体现;洛阳偃师商城遗址和郑州二里岗商城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安阳殷墟的发现、发掘及其数以万计的甲骨文的出现,都

有力地证明,殷商王朝从早期到晚期,皆把都城建在河洛地带的中心区域内。夏和商两个朝代在河洛大地上建起了以华夏族为中心的多民族的国家。继夏商之后的是周。周公营建洛邑和制礼作乐,对整个周文化,乃至对中国后世几千年的文化和制度,无不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后的先秦诸子,如老子、庄子、墨子、商鞅、韩非、苏秦等等的河洛志士仁人们,著书立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由此而开创了中华学术史上的辉煌时代。进入汉唐鼎盛时代之后,河洛地带又成了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代新儒学以及宋明理学的发祥地。河洛文化真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无愧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最重要的源头之一。

第三,关于河洛易学文化的渊源问题

《易经》一书,在古代被认为是古经中的群经之首和三玄之冠;在现当代,又被视为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发端。作为易学文化的标志来讲就是《易经》,而研究和探讨《易经》的这一学问被称为易学。易学文化历时长达二、三千年之久。《易经》所诞生的时代及其地域,不论从地面文献资料,还是从地下文物资料,皆集中于殷周时代的河洛地带。那么《易经》的渊源又在哪里?其时代和地域又如何辨析?有神话般的传说,又有文物资料的考证,可靠可信的释读又该如何?对于这个问题,史善刚先生所主撰的《河洛文化与中国易学》卷作出了具有说服力的回答。史先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大量的有关文物考古资料中,来论证和阐明这一问题的。这种研究《易经》的态度、思路和方法应予提倡。

第四,关于河洛文化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问题

河洛文化虽产生和形成于中原河洛地带,但是它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外延,绝非囿于一个地域之内。它所涵盖的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它所体现的是中华五十六个民族的辉煌历史。对于河洛文化所反映出的民族精神,该丛书把它概括成以下几个方面:

1. 刚健自强的“龙战”精神(英勇果敢);
2. 厚德载物的人道精神(宽厚善良);
3.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爱国精神(民族爱国);
4. 和谐统一、和睦相处的和合精神(团结统一)。

这样概括是否准确？是否只有这四条？是否还可以从其他角度概括？都可以再思考、再研究。但是该丛书所概括的英勇果敢、宽厚善良、民族爱国、团结统一等四个方面，确实抓住了我国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构成的大家庭。中华文化是多元融合的大文化。上下五千年，中华大地孕育了丰富灿烂的各民族、各地域的文化，除河洛文化外，还有齐鲁文化、荆楚文化、东吴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草原文化、关东文化、闽台文化、西域文化、雪域高原文化等。但是，河洛文化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内容对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各地域的文化都有深刻的影响，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最基本的精神、最基本的特征，还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进步、富强和发展的最主要的精神财富。今天，弘扬这种民族精神，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国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文化研究是很复杂的，若想选好主题，把好方向、拿出有重要学术理论价值和实践应用意义的成果来，谈何容易？因此，对“河洛文化与民族复兴研究丛书”研究、探讨和编撰的专家学者们，应该表示敬意和谢意。

张国祚

绪 论

作为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的首善地区,河洛地区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综观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可以发现,自中华文明诞生以后,河洛地区就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一、河洛文化对外传播与交流的基本问题

研究河洛地区的对外交往史,需要对与本课题相关的基本问题加以界定。

其一,确定本课题研究的河洛地区的地域范围。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河洛地区采用了学术界已经基本定论的观点,即河洛地区地域范围是指以洛阳为中心,东至郑州、中牟一线,西抵潼关、华阴,南以汝河、颍河上游的伏牛山脉为界,北跨黄河以汾水以南以及济源、焦作、沁阳一线为界。^① 这一地域范围的划分经过众多学者的论证,已经为学术界普遍接受,我们研究的河洛地区范围基本上是以此为界的,间或选材有溢出现象,也多是为了论述的方便。

其二,确定河洛地区对外交流的国家和地区。本课题研究以河洛地区为中心来确定目前在中国境外的地区和国家。当然,因为研究的需要,有时还包括目前中国境内的一些地区,如传统所说的西域地区和交趾地区。域外的国家和地区,东部地区包括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所建立的国家和政权,南部地区包括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和政权,西部地区则主要以丝绸之路为线索加以考察。通过对这

^① 薛瑞泽、许智银:《河洛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64—75页。

些国家和地区与河洛地区交往的历史考察,可以进一步明了河洛地区在历史上的东亚地区乃至世界文明进程中的地位。

其三,文化交往的双向性是我们在本课题研究中关注的又一个重点。我们知道,文化交流虽然说在某个历史时期单向性的特色很明显,但如果忽视文化交流的双向性问题,即先进地区的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传播和影响到相对偏远地区的同时,这些地区的文化亦可能回馈先进的文化,使先进地区的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多彩。如果不对这一文化交流的双向性加以关注,就无法真正理解先进文化的内涵日趋扩大的重要原因,即吸取周边地区的文化使自己的内涵更加丰富。鉴于上述指导思想,我们在研究河洛地区的对外交往时,不仅要研究周边地区的国家和地区到河洛地区“朝贡”的历史,进而显示河洛文化强大的辐射力和向心力,同时还要涉及河洛地区的文化通过不同的方式传播到周边地区的过程及其结果。由于河洛地区的独特政治地位和文化影响力,从总的方面来讲,对外交往以河洛地区的对外影响占主导地位。但我们同时也不忘记用一定的篇幅关注周边地区文化对河洛地区的影响,庶几才能反映出历史的全貌,进而明白河洛文化发展壮大过程也同样离不开吸收周边地区的文化丰富自己文化内涵的历史真实。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地反映出文化之间交流的双向性,才能够明白河洛地区的文化为何能在历史上发扬光大。

其四,考察河洛地区的对外交往,必须与河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认识河洛地区的发展史和河洛地区的对外交往不难发现,河洛地区的发展历史有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而这一演进过程也是河洛地区社会化的过程,即从早期区域的历史发展成为全民族历史的核心,乃至最后发展成为全球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进程的实现大体可以划分为多个历史阶段。具体来讲,先秦时期河洛地区的发展历史主要是以本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为主,并逐步扩大其影响力,开始具备了代表中国历史发展主序列的文化要素。主要表现为,在夏朝时期,河洛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及社会制度虽然走在全国的前列,但仍然是以区域为主,且其影响有限。到了商朝,随着商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势力的扩大,黄河中下游的主要地区已经为商人所控制,所以商代文化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夏代。及至周武王灭商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都为周王朝所控制,其自身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远超前代,文化的影响力

开始跨越黄河流域,扩展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从楚、吴越等国的建立即可略知一二,而且远在域外的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地区的政权也到河洛地区进行“朝贡”,显示出文化影响开始逐步扩大的趋势。这一历史时期可以看做河洛地区区域历史由萌生到壮大的历史时期,而且其所影响的地域在逐步扩大,由黄河流域逐步扩展到长江流域,并开始影响到域外地区。这也显示出河洛文化自产生以后就以文化的强大辐射力在东亚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进而奠定了河洛文化的领先地位。

秦汉时期是封建制度在河洛地区巩固和发展时期,也是河洛地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表现为封建制度得到广泛推行,封建经济得以全面发展,河洛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既代表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先锋,也促成了河洛地区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上与境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频繁往来,如日本列岛从汉光武帝时期开始朝贡,交趾地区在二征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也纳入汉朝的版图,汉政府在这里设置官吏进行管理。丝绸之路的开通,特别是东汉时期以洛阳为起点的丝绸之路线路的延伸,将河洛地区纳入进了东西文化交流的序列之中,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使深居中原腹地的河洛地区通过这条道路与亚欧其他地区建立起广泛的联系,文化交流也更加频繁。虽然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建都河洛地区的封建王朝的国力大小有所变化,对外的交往也时断时续,但从总的趋势来看,自秦汉以后,河洛地区的对外交往呈现出日趋频繁的态势,显现出河洛地区社会化的程度日趋提高,并且使文化的影响力及于域外。

隋唐时期,河洛地区作为当时的政治中心之一,其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达到该地区封建社会的顶峰,因为国都相继在东西二京之间摆动,对河洛地区产生了广泛影响,河洛文化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崇高的地位,而且波及周边地区和国家,以至于在日本列岛出现了影响深远的遣隋使和遣唐使,这些遣隋使和遣唐使有的就是以洛阳为目的地的。沟通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在唐代则达于极盛,出现了西域客商往来频繁的繁盛景象。与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和地区的往来也更加密切。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在隋唐时期河洛地区已经完成了社会化的进程,成为世界历史的重要核心,引领着世界文化的潮流,成为东亚地区的重要文化胜地。

二、河洛文化对外传播与交流的特点

统观河洛地区漫长的对外交往历史过程,从早期的初步交往到隋唐盛世的频繁交往,显现出河洛地区影响逐步扩大的总体趋势,而且各个阶段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不同的特色。

先秦时期,河洛地区因为社会经济尚处在逐步形成阶段,所以,河洛地区的对外交往带有主动的色彩较少,且呈现出间断性或被动的色彩。先秦时期河洛地区与朝鲜半岛的交往,从初期的传说开始,到箕子东走朝鲜,都显示了河洛地区对朝鲜半岛情况的认识过程。而这些不同史书的记载无不表明了这样一种趋势,即随着河洛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变动,河洛地区的社会文化开始通过民众的迁移传播到朝鲜半岛,随着河洛地区文化的传入,促使朝鲜半岛的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而以箕子为代表的河洛地区人的回返,又将朝鲜半岛的信息带回河洛地区,从而使遥远异域的传说变成了真实的历史印象。这也印证了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河洛地区的文化影响到了朝鲜半岛,朝鲜半岛的文化同样也传到了河洛地区。又如,南越地区与河洛地区的交往,从西周初年开始的“越赏贡”开始,到西周时期昭王南游的书写,都表明了黄河流域与南越地区交往的事实。再如周穆王西行的历史传说,虽然有后人附会的因素在内,但其间所反映的先秦时期开拓西域的理想与实践,应当说是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总而言之,在先秦时期河洛地区与周边地区的国家和政权的交往还处在初始阶段,所有现象都表现出稚嫩的特色。

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秦汉王朝已经成为东亚地区最强有力的政权,河洛地区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也进入兴盛时期。这一时期河洛地区的对外交流呈现出全方位的态势,文化交流的频率较之先秦时期逐步加快,交流的内容也日益增多,表现为与河洛地区交流的国家 and 地区在增多,信使往来接连不断。除此之外,商业往来开始占据双方交往的重要地位。当然,在这一阶段因政治的原因促使河洛地区对外交往的因素仍然很多。在朝鲜半岛地区,汉武帝灭卫右渠以后,郡县制开始在朝鲜半岛确立,形成了以汉文化为特色

的全面传入的时期,促使了朝鲜半岛的快速向前发展。在西域地区,丝绸之路的开通无疑成为沟通河洛地区与欧亚大陆其他国家往来的通道,西域地区的物产、风俗开始传入河洛地区,河洛地区以丝绸为代表的物产也传向西域地区,而且西域的各种情况开始为内地所知悉。尽管在东汉时期因为种种原因出现了西域“三通三绝”,但以班超为代表的使臣出使西域,特别是甘英远达波斯湾沿岸,无疑拓展了人们的视野。而东汉和帝时大秦使者到达东汉首都洛阳,使东西两大文明通过接触有了新的认识,这应当是两汉时期东西文化交流的新收获。

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的社会陷于稳定和混乱交替存在的历史时期。曹魏西晋近百年的社会稳定,使东汉末年遭受兵燹之灾的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逐步恢复,为与境外地区和国家的交流奠定了物质基础。虽然在曹魏时期收缩了对西域地区的控制,但在东北亚地区与朝鲜半岛的交流则因为阻碍较少而比较频繁。十六国时期黄河流域再次陷于战乱,对外交往停顿。在北魏占据黄河流域以后,特别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洛阳再次成为北方地区对外交往的重心,向东虽然与朝鲜半岛仍有战争冲突,但从总的趋势来看河洛地区与朝鲜半岛的诸侯国仍然建立起了频繁的联系。在西域地区的交往则日趋繁盛,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所描写的情况就反映了河洛地区在东亚地区文明中的核心地位。此间河洛地区的对外交往呈现出间断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而且文化交往的恢复与发展较快,尤其是经历十六国的大乱之后,河洛地区的对外交往能够迅速恢复应当得益于河洛地区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河洛文化强大的复兴能力。

北魏末年因为尔朱荣所发动的河阴之变与农民起义的打击,黄河流域分裂为东西魏并最终形成东西对峙的局面,在北齐末年,北周统一了黄河流域,隋代周之后,又统一了全国,河洛地区又一次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与社会中心之一,特别是隋炀帝迁都洛阳以后,重新确定了洛阳政治的核心地位,对外交往所演绎出的丰富多彩的篇章,再次显示出中外交往的辉煌历史。从裴矩西行,到唐玄奘周游印度各地,都将西域地区的社会风情、民俗物产介绍到了中国,而且这些人都与河洛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唐玄奘就是洛阳附近偃师人,历经千难万险回到洛阳,唐太宗也是在洛阳接见了。对于东部的朝鲜半岛,隋唐两朝在早期曾经与朝鲜半岛有过多次战争,但在社会太平之后,河洛地区与朝鲜半岛的交往开始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不仅信使往来不断,而且河洛地区成熟的社会制度开

始影响到朝鲜半岛,引起了朝鲜半岛的巨大变化。与日本列岛的交往也同样如此。通观这一时期河洛地区与周边地区的国家和地区的交往可以看出其所具有的特点已经与前期明显不同,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的特点。

综观河洛地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往可以这样认为:河洛地区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的日益壮大,为河洛地区的对外交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河洛地区社会化程度的加深和影响的日益扩大,加速了河洛地区成为东亚地区的文化中心,与周边地区交往呈现出逐步增长的势头,提高了河洛地区的文化品位,其各个时期所形成的特点也与中国历史的进程相伴随,再次彰显了河洛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三、河洛文化对外传播与交流的历史地位

对河洛地区对外交往所拥有历史地位的认识,应当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来进行考察。只有将河洛地区放在世界历史的序列中加以考量,才能够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认识到河洛地区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为了弄清河洛地区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地位,我们有必要首先弄清在与河洛地区交往过程中周边地区的发展状况。我们知道,当河洛地区的社会经济已处在萌生和发展阶段时,周边地区的许多地方尚处在混沌未开发的历史阶段,河洛地区的发展远远超越当时周边地区和国家的历史进程。在东北亚地区,当河洛地区已经进入有阶级有国家的奴隶社会时,朝鲜半岛的社会历史进程还处在传说时代,而且其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发展还是以箕子为代表的黄河流域民众进入朝鲜半岛传入先进文化的结果。其社会历史的进程较之于河洛地区要落后数个世纪。日本列岛的情况也是如此,见诸史书记载的日本列岛在东汉末年还处在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及至汉文化传入后,才使日本列岛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东南亚地区,先秦时期仅仅只有传说的内容流传于世,到了两汉时期,才由封建政府在此建立起可以控制的政权。西域地区出现了周穆王西行的传说,但对于西域地区的认识及真正发生大规模联系则是在张骞开通西域以后,从西域所流传到内地的一些情况来看,这一地区的社会发展要

远远落后于河洛地区。从河洛地区所交往的国家和地区来看,河洛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要高于周边国家和地区,并且以文化的绝对优势影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这再次证明河洛地区在世界文明的进程中具有领先的地位。

河洛地区的对外交往还表明,河洛地区与周边地区和国家文化交流是不对等的,可以说在整个河洛地区的对外交往过程中,河洛地区的对外影响占据了主流,也就是说河洛地区以其先进的文化传播到周边地区,影响了周边的地区和国家,使其社会发展迅速摆脱落后的局面,走上了与河洛地区封建政权一样的道路。这从日本的大化改新即可看出。日本的大化改新,使日本通过学习唐王朝的政治制度,并将其移植到日本社会,促使日本社会迅速摆脱原有的社会制度而走上新的社会发展道路。目前学术界关于日本大化改新之后社会发展的道路,即大化改新之后日本是封建制度抑或是奴隶制度还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日本通过大化改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制度。加以后连续不断的遣唐使派往唐朝学习先进的文化,日本社会从此迈上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道路。这一切都应当归功于以河洛地区为代表的文化的影响力。从文化交流的主导地位也可以使我们充分认识到河洛地区主流文化的区域位置。

在本书研究过程中,我们将按照不同的地区方位,对河洛地区与周边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研究,采取先朝鲜半岛,然后是日本列岛,再着眼东南亚的次序进行。因为丝绸之路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代名词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所以我们以“河洛文化与丝绸之路”作为研究的题目,关注东西文化交流。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各个地区都采取按照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加以考察。